

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的“上海经验”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束定芳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基础外语教育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除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所具备的众多天然优势外,国家给予上海的特殊教育改革政策,上海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政策创新、经费投入和有效管理,上海教研系统所构建的一套高效有序的教研管理体系、一支高素质的教研员和名师队伍、一套日臻成熟的教师培训机制、一批外语特色学校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上海基础外语教育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大支撑。近年来,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通过理论研究、教材编写、教师培训等工作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机构、教研部门、国内外专家和一线教师之间的联系和良性互动,逐渐形成了上海基础外语教育教、学、研的新生态。

关键词:基础教育、外语教育、上海、教师发展、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21)06-0864-10

DOI:10.19923/j.cnki.fltr.2021.06.006

1. 引言

上海的基础外语教育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一方面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跨国企业最集中的沿海城市之一,外语人才需求大,市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外语素质较高,对外语学习重要性的认同度高,对外交流活动频繁;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给予上海的特殊政策、上海市政府的教育改革举措、较高的基础外语教育教研水平、比较完善的教师培训机制和优秀的外语师资、家长对学生外语学习的重视和支持¹等。这些都为上海基础外语教育水平总体领先其他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上海基础外语教育全国领先的标志

上海基础外语教育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有5个主要标志。1)丰富的多语种教学。上海目前是国内在中小学开设外语语种最多的城市,达15种以上。除了英语,还开设有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葡萄牙语、韩

语、泰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瑞典语、希腊语、土耳其语等语种的课程。上海也是开设多语种学校最多的城市,目前有 20 多所学校开设了一门以上的外语,数所学校设立了双外语班,学生的两门外语能力都能达到较高水平。2) 优秀的国际竞赛成绩。上海自 2009 年起参加国际 PISA 考试,连续数年获得优异成绩,名列全国第一;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用英语参加各类国际竞赛,如计算机技术、数学建模、模联等,屡获国际金奖、银奖。3) 众多的国际学校。上海是国际学校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²。4) 持续增长的留学人数。上海每年通过雅思、托福、SAT 等海外考试进入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高校读书的学生有 1 万人以上,居全国大城市之首³。5) 较高的外语师资水平。中小学英语特级教师有 50 多位。多所国际学校和部分中学的国际课程教师用英文教学;每年有数十位中小学数学教师应英国教育部邀请,赴英国用英语教授数学,等等。

3. 上海基础外语教育何以领先

上海的基础阶段外语教学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除了天时(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地利(国际大都市、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对外语能力重要性的高度认同、比较完善的基础教育管理和创新体系)之外,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构建了一个合理、高效的基础外语教育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见图 1)由政府机构的政策创新机制、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育特色创新机制、充足的经费投入、高水平的教学教研管理体制、有效的教师培训体制等分支体系构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促使整个生态体系不断优化组合、动态调整、高效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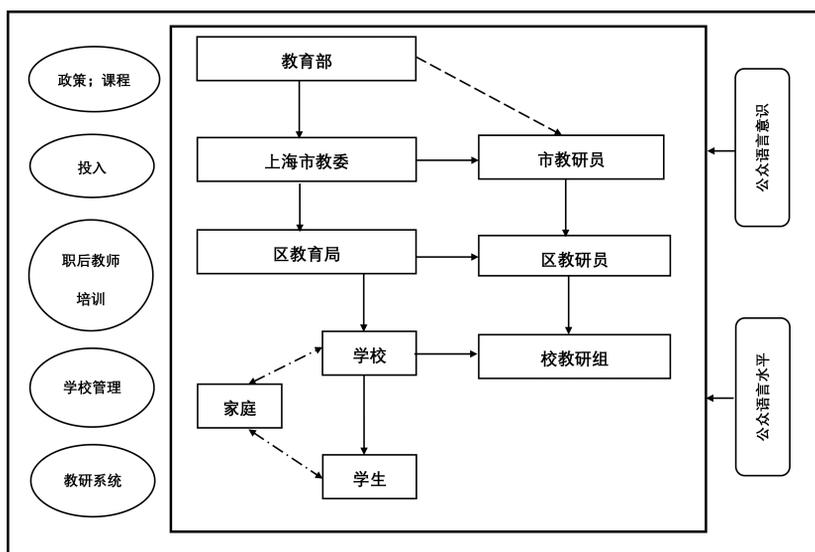


图 1. 上海基础外语教育生态体系

自2016年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成立以来,基地作为一个沟通政府机构、国内外学术界、中小学教研系统、一线学校和教师的学术研究和服务机构,通过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高层次的学术活动等为原有的基础外语教育生态系统注入了新的元素,重新定义了原有的教育教学和教研互动关系,与基础外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之间建立了有效的互动合作关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体系(见图2),形成了一个基础外语教育的“上海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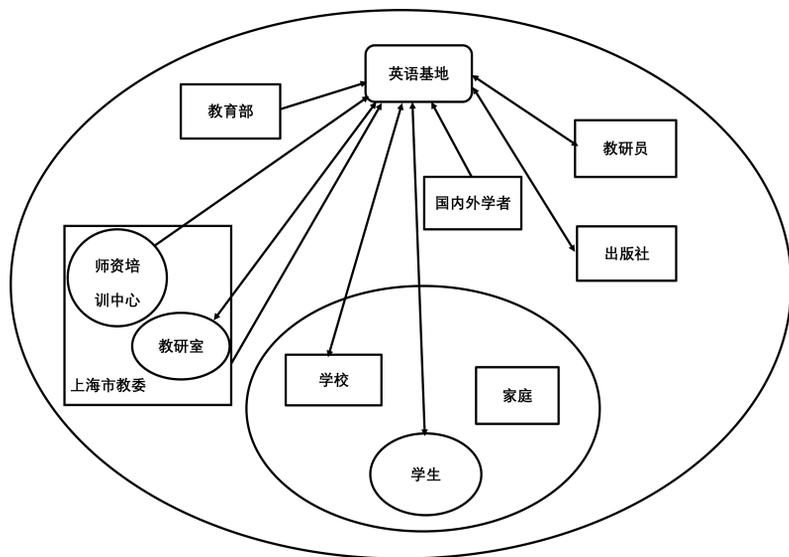


图2. 上海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体系

下面就构成上海基础外语教育生态体系的几个关键要素以及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在此体系中的重要贡献进行简要论述。

3.1 创新教育教学政策

上海市基础外语教育作为上海市基础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离不开上海整体基础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运作机制和政策创新。而上海市基础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来自国家对上海的特殊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针对上海的社会需求和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创新性制度和政策安排。

首先,就国家政策而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市中小学在课程和考试方面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国家层面,教育部负责制定各科目全国课程标准,但上海市和另外几个(试点)省份获准自行编制课程标准并编写教材。上海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启动课程改革,发布了针对各科目的《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中小学可根据本校特色自行编制校级课程。此外,教师在教材选用和教学方法方面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2018年,在普通高中新课标颁布以后,

上海市获教育部同意,在执行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新课标的情况下,除语文、历史和政治三门学科之外,可自行组织编写符合上海市实际情况的各学科教材,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审核通过后在上海和全国使用。

上海一直是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领军者。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即成为第一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据媒体报道,“综合教育改革”让上海的教育大变样。大中小学、不同领域的教育发展都呈现出“三个转变”:从依赖资源投入向制度机制创新转变,从单项改革突破向系统集成提升转变,从教育系统“小循环”向融入国家整体战略和上海社会发展整体格局的“大循环”转变⁴。

上海所获得或享受的这些国家层面的特殊政策,为上海市地方教育政策的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可能,也为教研部门和各学科教研员以及骨干教师提供了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教研课题和发展机遇。在上海,许多英语学科教研员和中小学骨干教师有机会直接参与编写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在学习、研究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对上海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并与高校专家一起,编写上海市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这为一线骨干教师提供了难得的提升和发展机会。正因如此,上海市教研员和特级教师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具备了很高的素养(陆伯鸿 2017)。

3.2 创新课程体系,编制特色教材

3.2.1 自主编制学科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教材

由于上海的经济优势及其所享有的特殊政策,上海市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充足,市教委创新意识强,政策指导作用显著(Liang *et al.* 2016)。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上海市教委启动了基础教育两期课改,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方案、学科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了上海市地方教材,对教学过程、考试评价等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根据一期课改要求,英语学科针对学习内容提出了突出工具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要求,在英语教师中形成了英语教学的新观念和新思路。为期10年的一期课改为二期课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期课改构建了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三类课程,并明确课程标准作为描述学习结果的基本定位。市教研室重点根据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结合英语学科特点,提出了相应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控制必修课,增设选修课,加强活动课。由此形成了从小学到初高中一条龙的学习目标与要求的整体设计。2004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2015年又编制了《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和《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英语课程的价值及培养学生继续学好英语和用英语学习的能力。二期课改

的另一特色就是一纲多本。从 1998 年起,上海市从海外引进《牛津英语》并经改编后在上海使用。同时,组织专家和一线教师自主编写了一套英语教材,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英语教材。市、区两级学科教研部门具体指导教材使用和教学法研究。各类学校根据教育管理部门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区、本校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教材及必要的辅助材料。

另外,上海市是全国最早在高考中增加英语听力考试和口语考试的地区。这对推动中小学英语教学课程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学生的听说能力受到高度重视。

2015 年,上海市教委在上海市相关高校成立了各基础教育学科研究基地,其中包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其主要任务为课程标准研究、教材编写或审定、教师培训等。2018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上海市教委为此成立了上海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办公室,协同市教研室牵头各学科基地,启动上海市高中学科的新教材编写。2020 年 7 月,高中一年级开始使用本市组织编写的数学和英语教材,新教材培训和教研活动也同步启动。

3.2.2 开展多语种教学,布局多语种人才培养

2014 年,根据《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上海市教委区县基础教育外事工作委员会 2014 年度第一次工作例会的精神,上海市教委决定启动上海市中小学生非通用语种学习计划。市教委批准在 6 个区 13 所中小学试点设立“上海市中小学非通用语种教学基地”,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开设非通用语种教学班,包括希腊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泰语 7 个语种。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出了由专业教师指导、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组成的教学团队,实施教学实践并组织相关文化活动。经过几年的试点和实践,上海市中小学多语种教学取得了初步成果。2018 年 6 月 10 日,中小学非通用语种学习计划成果展示暨“上海市中小学非通用语种学习计划项目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上海风华初级中学举行。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等 15 所中小学被授牌为“上海市中小学非通用语种学习计划项目实践基地”。由 15 所基地学校呈现的一台以 9 种外语、歌舞、戏剧、配音、朗诵的精彩文艺表演作为该项计划的成果汇报,充分展示了上海在中小学外语教学,特别是多语种教学方面的新尝试、新成果⁵。

3.2.3 启动国际融合课程试点,培养国际化人才

2013 年,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普通高中国际课程试点工作的通知》。2015 年,21 所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经上海市教委批准成为国际课程教学试点

学校,包括 10 所公办高中、10 所民办高中和 1 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

国际课程试点对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育的国际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试点学校与海外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选送教师海外学习与培训,积极引进或改编海外教材,并要求教师用外语进行非外语的课程教学,大幅提升了中小学教师的外语整体水平。以上海市曹杨二中为例。2009 年起,该校成为上海市教委批准的高中国际课程试点学校之一。该校中德 DSD 国际课程班的课程以市重点高中创新班课程为基础,融合同济大学、德国高中部分课程(德语、专业导读、创新实验)的融合性课程。该课程面向学有余力且有志于成为卓越创新人才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该校每年招收高中生 400 人左右,其中 100 人左右入学后除了正常的英语学习外,每周还要多上 10 节德语课。两年半后,这些学生参加德国的语言水平考试(DSD),绝大部分学生达到 B1 水平。这些学生与其他同学一样参加高考,英语平均成绩也在 120 分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学生高中毕业时,两门外语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是成功的外语学习者。

4. 规范化、高水平开展教学教研工作

上海市拥有一支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教研员队伍。上海市教研室历任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教研员大都从优秀一线教师中选拔而来,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他们在上海市教研室的统一指导下主持制定英语学科的课程方案和外语教师教学评价标准,组织全市外语教学研讨,同时参与全国层面的教学研讨和理论培训活动。在多年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他们对基础外语教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解,积累了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教学指导经验。全市 16 个区的数十位区级教研员大多具有特级教师称号。他们根据上海市教研室的要求,结合各区的情况,创造性地组织教学研究和教学评价活动,为提升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育的整体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近十多年来上海市市区两级教研机构和教研员们在基础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2006 年,上海市教研室提出了外语教师的教学评价标准,完成了全员教师培训,规范了全市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2007 年,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教研室加强了日常教学工作的监督,提出了备课、上课、作业、评价、辅导 5 个教学环节的具体要求。2007 年,上海市教研室完成了英语学科两纲教育实施纲要和案例分析,市区县 862 节录像课在网上互动拓展了英语课堂教学研究的平台。同年,《改进中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几点意见》颁布。2009 年,市教研室在课程与教学调研过程中,运用试卷分析工具对学校命题工作进行指导,逐渐规范考试命题的流程。2015 年起,上海开展学科单元教学设计研究,促进教师对教材和教学的结构化思考,为学校教研组的备课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2020 年

2月,在新冠疫情期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组织中小学各级名师和骨干教师,以“空中课堂”的形式,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优质课程,同时也为其他教师提供了观摩学习优秀教师以提升自己的机会。同年9月起,上海市教研室为新教材的推广举办“一月一研”教研活动,邀请高校专家和中学名师与使用新教材的教师进行研讨和点评,对提升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上海市市级教研员们还在多年的教研过程中收集一线教师遇到或提出的各类问题,并从中提炼出关键问题,认真调研、学习理论、集思广益,为这些关键问题提供答案,促进了各学段的教学研究,在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汤青、赵尚华2018)。

5. 构建严密的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体系

除了教育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之外,上海的教育政策能够在学校层面普遍得到精心实施,而且很多政策的实施深度和广度都高于宣传口号。此外,上海在教师培养、支持和管理方面的工作也非常突出,因为教师是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所有举措的核心所在⁶。

5.1 教师培训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上海市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师教研和专业发展系统。学校层面的教研组活动侧重协作型专业发展,以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各学校负责依据对每名教师的评价结果制定教师专项培训计划。上海要求新聘教师在其入职后的头五年内完成至少360小时的专业发展培训。在此基础上,所有教师需再完成540小时的培训,方可申请专业晋升。各校也普遍建有教师专业发展和表现评价方面的重要平台,即教研小组和听课小组。

另外,上海市政府在人才引进、教育改革试点方面也大胆探索,为各学校和各学科的教师提供发展机会。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英语骨干教师,包括特级教师。从1999年起,市教委组织大批英语教师赴英语国家进行2—6个月的语言和教学培训交流,为骨干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自2001年起,青年教师新教材教学展评列入每年常规评比项目,2005年全面建成上海教育资源库。

5.2 名师与“双名计划”

2006年开始,市教委正式启动了普教系统双名工程。该项目充分发挥上海市一批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名师”的优势,为优秀的中青年英语骨干教师搭建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他们的专业发展。例如,上海市市三女中原校长和特级教师何亚男老师与特级教师孙丰、张玉庆、金怡合作主持了1—3期

名师培养基地,根据学员的发展需求设计培训课程活动,聚焦英语教学问题,通过读书学习、课题研究和课堂实践磨砺,提高其理论水平、专业素养和教研能力。基地学员围绕教学的关键问题开展实践研究,编写、出版了一批基础外语教学研究著作。目前已有 10 人左右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或正高级教师,在上海市基础外语教育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韩晓蓉 2019)。

2018 年,上海市教委启动了第四期“双名计划”(名校长和名师培养计划),数十位英语学科名师或特级教师入选该计划。他们分别组建了“高峰”和“攻关”等项目小组,定期学习、交流。各区还通过选拔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组建不同层次的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定期切磋交流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经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6. 创建外语教育特色,推动优质外语教育资源辐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市共有公办外国语小学 11 所,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 10 余所,其他外国语学校数所,如世界外国语学校等。这些学校的外语教育特色,特别是多语种教学方面的探索,对构建上海市基础外语教育的整体生态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6.1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上外附中)

上外附中始建于 1963 年,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在全国各地创办的 7 所外国语学校之一。50 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外事、外交和外贸后备人才。学校从 60 年代起就开设了 6 门外语,2018 年又增加了 4 门与“一带一路”国家有关的语种,包括阿拉伯语等。每年有 100 多名学生通过保送考试进入国内一流大学继续学习外语,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通过国际考试进入欧美一流高校留学深造。上外附中外语教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有部分学生同时学习两门外语,高中毕业时两门外语都能达到熟练使用的水平。最近几年连续有多位同学参加两门外语的全国演讲比赛并获双料冠军。上外附中的学生不仅获益于学校的外语特色和传统,还获益于优秀同学之间的互相激励、互相学习。学校英语课的传统特色,如晨读、课堂 5 分钟英语汇报(内容自选)、国际交流、社团活动等也锻炼了他们的综合素养和语言实践能力。

6.2 甘泉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是一所建立于 1954 年的初高中一贯制公办学校,是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ESD)示范学校、德语 DSDII 语言项目德国政府指定合作学校等。学校以“日语见长、多语发展”为办学特色,目前开设了英、日、德、法、西语为第一外语,韩、泰语为第二外

语。学校设有双外语实验班、零基础日语班、零基础西班牙语班。学生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各类多语种竞赛中屡获佳绩,不仅蝉联全国高中生日语演讲比赛冠军,还获得了全国多语种技能大赛的日语、德语双料冠军。

7. 发挥高校科研优势,构建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

2016年7月,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以下简称“英语基地”)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设立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上海市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英语基地充分利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术资源,联手国内国际英语教育领域一流专家学者,发挥了高校对上海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智力支持作用,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 教师培训工作产生重要影响。英语基地成立以来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师培训活动,促进了一大批优秀骨干教师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快速成长。截至2019年底,英语基地已举办50余场面向全市开放的大型教师培训工作坊,开展了20余次外国专家“进校园”活动,为近一万人次提供了公益性质的教师在职培训。共有50多位教研员、中学一线教师参与了高中英语教材和配套用书的编写工作。2020年,基地组织多位上海市区级教研员及骨干教师承担教材的有关研究项目,并配合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教学研究室、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等完成了两轮市级培训,10余场区级培训。

2) 国际国内交流平台建设效果显著。英语基地通过建立合作校制度、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为专家、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搭建起沟通合作的平台。英语基地成功举办了“中国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2016)、“中国基础外语教育高层论坛”(2017)、“首届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多语种教育教学研讨会”(2018)以及“2018年国际教材开发研究会议”、“青少年外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首届国际双年会”(2019)等高层次国际会议,为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深入交流和探索的平台。

3) 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成果丰硕。经过五年左右的探索和努力,英语基地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取得了经验和成果,出版了《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国别研究报告》《基础英语教学:现状、目标与途径——上海市英语特级教师访谈录》《栴风沐雨,春华秋实——上海市英语特级教师风采录》《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理论与实践》等著作,编辑出版了《英语教育与教学研究》论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已发行4期),创办了英文国际学术期刊 *Language Teaching for Young Learners* (由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已发行5期),为上海市推进和实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改革做出了理论贡献和成果积累。

8. 结语

上海的基础阶段外语教育,得益于上海的天时地利和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管理体系,更是上海市政府,特别是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在基础教育领域锐意进取和改革创新的结果。上海所享受或创造的政策优势及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造就了一批外语特色的学校,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研员队伍和一大批优秀的骨干教师。他们在上海的基础外语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英语基地的成立也为上海市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基础外语教育教学生态体系。上海市建立的规范而严密的教研系统和教师培训系统、高质量的教研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上海中小学外语教育教学的水平。上海的基础外语教育已基本达到了上海市教委提出的“国家标准、国际水平、上海特色”的目标和要求。

注 释

1. 根据《2018年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白皮书》,上海市学员数量稳居第二。沿海发达地区家长对在线教育的接纳程度更高,孩子英语学习的听说阅读能力明显超过其他区域(<http://www.yywhblh.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0&id=907>)。
2. 2020年,广东、上海、江苏三地获认证的国际学校数量已超过百所,其中广东以140所位居首位;上海市以112所位居第二位(<https://zhuanlan.zhihu.com/p/337133083>)。
3. 详见<https://www.jiemodui.com/N/112638.html>。
4. 来源:《人民日报》“上海实施教育综合改革7年,214项改革任务圆满完成”(2021-02-24)。
5. 详见<http://www.osa.shisu.edu.cn/a8/c3/c730a108739/page.htm>。
6. 详见<https://news.un.org/zh/audio/2016/05/308152>。

参考文献

- Han, Xiaorong (ed.) [韩晓蓉(编)]. 2019. *How the Schools Became Famous: Interviews with 22 School Principals in Shanghai* [C].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名校的炼成——与上海22位中学校长对话录》。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 Liang, Xiaoyan, H. Kidwai & Minxuan Zhang. 2016. *How Shanghai Does It: Insights and Lessons from the Highest-ranking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 Lu, Bohong [陆伯鸿]. 2017. *A Sketch of Teaching Research in Shanghai: Explorations in Transforming Teaching Research in Basic Educ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上海教研素描——转型中的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探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Tang, Qing & Shanghua Zhao (eds.) [汤青、赵尚华(编)]. 2018. *The Past: 30 Years of English Curricular Refor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hanghai* [C].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时态——上海市中小学英语学科课改3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21-05-20;修改稿 2021-08-27;本刊修订 2021-09-06

通讯地址: 200083 上海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

principle underlying the dynamic translating process.

On the status of “the third code” in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its descriptive model (p.842)

SHANG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The translational language not only has its independence as the third code, but also claims the necessity and plausibility to be adopted into the frame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CA). It signifies that CA has entered “a third space” as a natural course with significant expansion of connotations. This would cause major chang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methodology for CA.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single mode of a contrast between two languages, four more contrastive modes ar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CA: a contrast among source language, translational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a contrast between translational languages, a CA-based translation study, and an analysis of modulation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l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e new system of CA goes beyond the comparison of two languages but to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codes which might throw light on promoting harmony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y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 854)

PAN Wengu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The paper explains in three aspects the notion of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LC)” stipulated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 Undergraduate*. First,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stipulation is a return to the fine tradi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 respons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Secondly, for the notion of CLC,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cont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Chinese culture” mainly refers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entering round the incessant pursuit for a well-governed world, and that “Chinese language” refers mainly to written Chinese including its classical form. It suggests that the best way to study Chinese culture is by scrutinizing the original texts. Finally, it touches upon how to put the stipulation into practice by proposing a three-in-one principl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embracing best texts, knowledge introduct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all wit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t the center.

The “Shanghai Model”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basic education (p. 864)

SHU Dingfang (Editorial Dept. of th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Shanghai has been leading China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when China reopened itself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ddition to the many advantages Shanghai enjoys as an international cosmopolitan, there are a number of other important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high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LT) in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in Shanghai. These factors include: 1)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gra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2) the educational reform policies tailored to the local needs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3) the effective education inspection and research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4) a maturing teacher in-servic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5) the efforts of a group of highly skilled and dedicat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pervisors and leading teachers, and 6) a number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that serve as models in exploring new practices in FLT, etc.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Center for Research in English Education (SCREE), a new FLT ecosystem that links and coordinates among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s emerging in Shanghai, both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textbook development, and in terms of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scholars and academics around the world.

A corpus-drive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2 learning of L1-minus and -plus semantic prosodies (p. 874)

LIU Ju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Semantic prosody (SP), largely hidden from explicit description, is difficult for L2 learning and research. This study began with a corpus-based investigation into L2 SP and defined two types of difficulties, namely L1-minus SP and L1-plus SP.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put forth some hypotheses on implicit and explicit learning of L2 SP. Then to test the hypotheses we conducted a corpus-driven learning experiment, which included an L1 influence-filtering measurement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SP knowledg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explicit learning in both types of SPs but no significant implicit learning occurred.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L1-minus SP is not directly accessible to learners' linguistic intuition, so both extra attention and adequate L2 proficiency are required to notice it. In contrast, due to the potential conflict within the L1 translations, L1-plus SP can be noticed when adequate attention is available. These processes primarily contribute to explicit learn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prosodic focus by Chinese learners (p. 887)

LIU Xirui & WU Yal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JIA Guan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Prosodic focus, as a component of intonation, is a new topic in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speech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whole speech chain and with semi-spontaneous speech as stimuli an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s the reference group,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prosodic focus by Chinese learners in terms of pitch movement, pitch peak alignment, duration and perception, and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ative speakers, Chinese learners' pitch patterns are less varied, the pitch range is narrower, and the pitch peak alignment is relatively delayed. These problems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he object contrastive focus condition; the correct rate of percep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roduction varies with different focus type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quisition and teaching of prosodic focu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situational systematicity in embodied semantic processing of L2 English abstract verbs (p. 900)

YU Shanzhi & LU Sh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Based on the basic propositions of Situational Systematicity Theory, this paper made an empirical study on situational systematicity in embodied semantic processing of L2 English abstract verbs by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through E-Prime 2.0 online tests and an offline task.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fferences in situational systematicity onl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rocessing cost of English abstract verbs. The respective processing costs of verbal condition, picture condition, and video condition increase successively,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curacy;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of high-level learners and middle-level learners in processing English abstract verbs, the former coming out with higher accuracy and lower cost, the latter with lower accuracy and higher cost. These findings verify the universality and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situational systematicity in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